

先秦喋血

黄朴民 著

华夏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喋血/黄朴民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6. 12
(历史爱好者)

ISBN 7-5080-1035-3

I. 先… II. 黄… III. 先秦战争—战争史 IV. E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7980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5 印张 133 千字 2 插页

199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5080-1035-3/K·088

定价:9.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作者简介

黄朴民,男,1958年8月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历史学博士,现为军事科学院战略部三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撰有《董仲舒与新儒学》、《白话孙子兵法》、《孙子评传》、《春秋军事史》、《战国军事史》(合著)、《道德经译注》、《白话吴子·司马法》等著作,并在海内外各类学术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

编者的话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而有活力的学科。它的鉴往知来、资治育人的社会功能，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孔夫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就是说，历代社会的因革都有规律可循，从夏、商、周的变化情况，可以推知后世的演变趋向。清人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知史。”章太炎说：“不读史，则无从爱其国家。”把读史知史视为做人 and 爱国的前提。于此可见前人对历史是何等重视。毛泽东爱好历史，并号召全党都要“学点历史”更是众所周知的。

我国老一辈史学家是很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的。三四十年代，范文澜著《大丈夫》，吴晗著《历史的镜子》，胡绳著《二千年间》等，五六十年代，吴晗主持编写“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都产生过很好的影响。令人欣慰的是我们这套丛书的作者中有不少知名学者和研究有素的专家。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史

学工作者关心和重视这项工作。让历史学走出书斋,服务现实。

这套丛书首批两个系列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和华夏出版社联合推出。如果读者需要,我们将继续编辑出版其他系列。

由于时间仓促,缺乏经验,一定会有许多不足之处。我们竭诚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把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1995年11月

目 录

序 言 从车辚辚到马萧萧	
——先秦战争大势鸟瞰	(1)

第一章 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	
——上古战争与国家起源	
一、炎黄文明的奠基战——涿鹿鏖兵	(2)
二、“家天下”的催化剂——启伐有扈	(6)

第二章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商朝和西周的开国战争	
一、吊民伐罪的号角——鸣条之战	(12)
二、从盟津到牧野——武王克殷	(16)
三、挽狂澜于既倒——周公东征	(22)

第三章 黯淡失色的王冠	
——剥夺周天子权威的两场大战	
一、骊山烽火灭宗周——镐京之役	(30)
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消亡	

- 邲葛之战 (35)

第四章 旧“军礼”的挽歌 ——春秋前中期的战争

- 一、宋襄公的末路——泓水之战 (44)
二、在退避三舍的表象背后——城濮之战 (49)
三、彬彬有礼的交锋——繻之战和鄢陵之战 ... (57)

第五章 兵以诈立 出奇设伏 ——春秋晚期战争的崭新气象

- 一、晦日用兵 出奇制胜——鸡父之战 (72)
二、千里奔袭 五战入郢——柏举决胜 (79)
三、声东击西 大创聚歼——笠泽争锋 (88)

第六章 “争地以战 杀人盈野” ——决定战国历史进程的重大战事

- 一、揭开三家分晋的历史帷幕——晋阳双守 ... (96)
二、庞涓遇上了克星——桂陵、马陵之战 (101)
三、乐毅、田单的较量——济西、即墨之战 (110)
四、纸上谈兵酿成的悲剧——喋血长平 (116)
五、“秦王扫六合”——秦统一六国之战 (123)

第七章 重归古战场 ——对先秦战争的文化透视

- 公刘与重诈——先秦战争的时代特色 (132)

二、内线与外线——先秦战争的地理因素	(138)
三、车战与步战——先秦战争的作战样式	(143)
后 记	(154)

第一章

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 ——上古战争与国家起源

-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 黄帝战胜蚩尤的涿鹿之战
- 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苗蛮集团
- 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
- 启伐有扈
- 尧舜禹禅让
- 夏启确立“家天下”统治秩序

一、炎黄文明的奠基战——涿鹿鏖兵

自从人类打开战争这个“潘多拉”魔盒之后，铁马金戈、硝烟骠鼓也就成了人类文明史上最基本色调之一。战争，作为流血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历史畸儿，它厮杀着生灵，吞噬着财富，在同类相残的累累白骨上，不断地推动着历史车轮曲折向前，聚积着最终将迫使它本身渐渐归于消亡的巨大能量。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战争在这块黄土大地上找到了可供自己淋漓尽致表演的广阔舞台。其中，黄帝战胜蚩尤的涿鹿之战，称得上是揭开中国古代战争史帷幕的重要一战。

大约距今五、六千年间的原始社会末年，在当时广袤的中华大地上逐渐形成了若干部族集团。它们主要有生活在黄河中游及其邻近地区的华夏集团；以泰山为中心的东夷集团和以洞庭、鄱阳两湖为中心的苗蛮集团。其中华夏集团以黄帝、炎帝两大部族为核心。它们分别兴起于今陕西地区、山西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经过阪泉一战，黄帝部族战胜了炎帝部族，成为本集团的领袖，两族趋于融合，并沿着黄河两岸向今华北大平原西部地带全面推进，在到达今太行山以东地区后，便在那里定居下来。与此同时，兴起于黄河下游地区的九夷部落（东夷集团的一支），也在其著名首领蚩尤的统率下，以今山东为根据地，由东向西方发展，开始进入华北大平原。双方之间为扩大各自的生存空间，争夺适于浅耕和牧放的中原地带以及实行血亲复仇，而不断地发

生冲突。这种冲突日益激化升级的结果,就只能是导致大规模的武装交锋,以一决雌雄,涿鹿之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全面爆发的。

据说蚩尤族部众勇猛剽悍,骁勇善战,而且又善于制作精良坚利的兵器,“以金作兵”,战斗力很强,“威振天下”。其推进到今河北涿鹿县一带古称涿鹿的地方后,首先同先期抵达那里的炎帝族展开了一场厮杀。蚩尤族实力强大,攻势猛烈,炎帝族根本抵挡不住,被迫撤离“九隅”,向西败逃,同时向同集团的黄帝族请求救援。

黄帝族为了履行同一联盟中兄弟部族互相救助的义务,维护华夏集团的整体利益,就应允了炎帝族的吁请,收拢炎帝族溃散的族众,将势力推向东方。这样一来,便同锋头正健、踌躇满志的蚩尤族再度在涿鹿一带遭遇了。一场腥风血雨的大鏖战就此箭在弦上,势在必发!

当时蚩尤部族集结了所属的9个氏族81个支族的人马,在力量上占有相对优势。所以,双方势力接触后,它便依仗着自己人多势众、武器比较精良等条件,先发制人,气势汹汹地向黄帝族发起攻击。黄帝面临强敌,方寸不乱,镇定自若,率领以熊、黑、狼、豹、雕、龙、鸮等为图腾的氏族,沉着应战;并让“应龙蓄水”,即充分利用己方位处上游的有利条件,在河流上筑起土坝蓄水,以抑制蚩尤族的凌厉攻势。

“战争”初期,适逢恶劣的天气:浓雾弥漫,大风呼啸,暴雨倾注,这种气候条件,很适合于来自东方多雨环境的蚩尤族展开军事行动而相当不利于习惯在晴旱天气环境中作战的黄帝族,使得它连战皆北,“九战九不胜”,处境危殆。然而

时隔不多久,雨季过去,天气放晴,这样就给黄帝族转败为胜提供了宝贵的时机。黄帝族及时捕捉住战机,在玄女族的有力支援下,向蚩尤族发动猛烈的反击。

决定命运的时刻来到了,黄、炎两族上下同仇敌忾,决心和对手决一死战。其首领黄帝因势利导,利用特殊有利的天候条件——狂风大作、尘沙漫天,劲吹号角,高擂战鼓,趁蚩尤族部众迷乱失措、丧魂落魄之际,挥麾驱众向蚩尤族营阵冲杀过去,经过一场激烈的拼杀,终于一举战胜强劲敌人,并在冀州之野(今河北一带)擒杀了其首领蚩尤。涿鹿之战就这样以黄帝族为主体的华夏集团的大获全胜而宣告结束。战后,黄帝族上下毫不骄矜松懈,乘胜东进,一直开进到东夷集团中心地区的泰山附近,在那里举行“封泰山”典礼后才凯旋西归。同时,为了施加自己对东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黄帝还“命少皞清正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逸周书·尝麦》),即在东夷集团中选择了一位能附众的名叫少皞清的氏族首领充当该集团的领袖,继续统领九夷部众,并致力于使东夷集团同自己华夏集团互相结为同盟,依从于自己的统辖。

这场“战争”的大致经过情况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所透露的,因此更具体的细节已无从考索复原了。但是正如拉法格在《宗教与资本》中所说,“神话是保存关于过去回忆的宝库”,它毕竟是历史的投影,曲折地反映了历史事实的本身。从这层意义上来讲,涿鹿之战又是真实可信的,它是我国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过程中部族武装冲突的一个缩影,堪称为中国古代战争的滥觞。

黄帝族之所以取得涿鹿之战的最后胜利,关键在于其战争指导要比蚩尤族来得高明。具体地说,是他们已开始注意从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做好战争的准备。既“修德”,同心同德,一致对敌;又“振兵”,加强军备,发展实力,从而牢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战争进行过程中,黄帝族还善于争取同盟者,并能注意和选择战场,巧妙地利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天候条件,把握战机,后发制人,果断及时地实施反击,一举置强大凶狠的敌手于死地,建立起自己在整个北部中原地区中的最高首领地位。相反,蚩尤族方面虽然经济实力相对雄厚,人数较为众多,武器装备比较优良,但是由于其一味迷信武力,连年向外扩张,穷兵黩武,“好战必亡”,早已播下了战败失势的种子。在具体的作战指导上,又光知道死攻硬拚,而不善于随机应变,灵活机动,尤其是缺乏对天候条件变化的应急能力,缺乏对黄帝族大规模反击的抵御准备,因而最终惨遭败绩,以至错过了登上盟主宝座,控制中原的历史性机遇。

涿鹿之战在中国战争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其对后世的影响亦至为深远。概略地说,这场战争的规模已超出了单纯氏族部落之间的械斗,而发生在属于不同集团的部族联盟之间,战争的性质已带有部族首领争夺统治权(盟主)的性质。战争的结果,是有力地奠定了华夏集团据有广大中原地区的基础,并起到了进一步融合各氏族部落的催化作用。战争提高了军事首领的地位,胜利者的英名更加远播四方,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部族首领黄帝,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并被人们所逐步神化。这些情况显示出,涿鹿之

战乃是炎黄五千年文明的奠基之战。

二、“家天下”的催化剂——后伐有扈

当涿鹿战场上的厮杀声沉寂下去之后，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氏族部落之间的武装冲突依然在不断进行，经常杀得难解难分。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有共工与颛顼之间“争为帝”的战争，尧舜禹对南方地区三苗集团的长期征伐等等。在频繁的浴血交锋中，战争的性质也开始了合符其逻辑的变化，即开始由单纯的扩大氏族生存空间、实现血亲复仇目的的武装冲突，缓慢地向以掠夺生产资料和从事阶级奴役为战争过渡。这种局面的出现，是与当时整个社会发展大势相同步的，是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作用于军事领域的客观产物：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萌芽了，社会阶级的分化日益明显，初步形成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大对立阵营，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战争的性质自然要发生一定的变化；而连绵不断的战争，反过来又增强了社会变革的动力，催化了早期国家的诞生。

尧舜时代王权已经萌芽，禹伐三苗战争的胜利不仅进一步提高了军事领袖的威望，还加速了王权的形成，加上大禹曾因治水成功而贏取了很大的个人资本，更使得早期国家的诞生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从大禹曾“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执而戮之”（《国语·鲁语》）等传说来看，大禹时已建立了一个很大的联盟，并初具国家的雏型，参加

盟会的各部落酋长要执玉帛晋见盟主，违背命令迟到者则遭杀戮，参加联盟的各部落不再是平等的了。这意味着过去仅限于战场的军事首长权力，现在已逐渐成为一种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王权。

大禹既然拥有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权力，而这种权力又能带来更大的财富和享受，这时自然就不乐意再按照“禅让制”的传统，轻易放弃自己家族对联盟祭祀、行政、军事权力的控制。可是面对强大的传统力量，他也不敢贸然废弃“禅让制”，成为众矢之的。为此，大禹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依照惯例在议事会上先后提名皋陶和伯益作为自己的继任人选；另一方面又积极培植自己儿子启的势力，使之羽翼丰满，以便伺机用“传子制”取代“禅让制”。大禹的老谋深算最终一一尽遂人愿。当他去世后，他的儿子启即杀死伯益，召集钧台（在今河南禹县）大会，宣布自己担任领袖职务，正式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家天下”的王朝。这一石破天惊的举动，标志着早期国家的正式形成，中国历史从此由原始社会迈入了阶级社会。

传统是一种巨大而雄厚的惰性力量，面对这种翻天覆地的社会形态变革，代表旧传统、旧秩序的势力自然不会轻易甘心，它们不愿意承认现实，总是要千方百计对新的社会秩序提出挑战，并不惜诉诸武力，来恢复和维持旧的民主传统，继续走氏族公社制的道路。这种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没有任何调解的可能，只有通过战争来最后分出胜负，决定取舍，甘之战正是起到这个作用的关键一战。换句话说，大禹父子终止军事民主制下的“禅让制”，建立“家天下”的

“传子制”，实行王朝统治，成为引发甘之战爆发的直接导火线。

有扈氏在反抗新秩序的活动中充当了急先锋。关于有扈氏的来历，历史上存在着两种说法，一种观点是说它是夏的同姓氏族，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它为夏的异姓部落。其实这并不重要，问题的要害是它不服夏启接替夏禹掌权的做法，带头用武力反抗夏启的统治，企图凭藉军事手段来恢复过去的原始民主体制。

正在春风得意之中的夏启当然不能容忍有扈氏的嚣张挑战，他决心拿有扈氏开刀，杀鸡儆猴，维护自己的权威，巩固自己的统治。为此，他迅速地做出了出兵平叛的决策，点起一支兵马，浩浩荡荡杀向有扈氏盘踞的地盘。有扈氏闻报夏启前来征伐，也收罗人马，倾巢出动，准备和夏启大军决一死战。

双方军队在甘（在今陕西户县西南，一说在今河南洛阳西南）这个地方相遭遇。彼此都厉兵秣马，打算在战场上——见高低，一场关系到双方生死存亡、社会发展进程的大决战迫在眉睫。毕竟是夏启更富有政治头脑和军事韬略。他知道要夺取作战的胜利，必须先申明军事纪律，激发起将士们杀敌致胜的勇气。为此他在临战前夕郑重举行了军中誓师活动，宣布战场纪律，发出战斗动员。这就是《尚书》所载的著名《甘誓》。以下就是《甘誓》的大意：

诸位将领和士兵，我现在向你们发布以下的命令：有扈氏倒行逆施，一意孤行，作恶多端，罪不容死。上帝因此要灭掉它。现在我奉行上帝的意志去惩罚这帮恶棍，替天行道，

杀一儆百。我宣布：兵车左边的甲士，如果不善于用箭射杀敌人，便是不执行命令；兵车右边的甲士，如果不善于用戈矛刺杀敌人，便是不执行命令；驾驶战车的甲士，如果不懂得驾驭战马的技术，便是不执行命令。凡是坚决执行命令的，战争结束之后，我就在先祖的神位前颁行赏赐；凡是拒不执行命令的，战事完毕，我便在社神跟前实施斩首的惩罚。大家当心一点，我会把你们中间那些不努力完成任务的人以及子女变作奴隶的，以表示严正的惩罚。

在这里，夏启申述了征伐有扈氏的目的，强调了作战的纪律。他的部下听了这通训辞之后，都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系，自然而然形成了克敌制胜的共识。应该说，夏启的战前动员收到了振奋士气，提高战斗力的很好效果。

战斗终于打响了。夏启的部队在严格军纪的约束下，个个奋勇争先，全力杀敌。有扈氏麾下的将士何曾见到过这样的场面，几个回合下来，顿时阵脚大乱，全线崩溃。夏启乘胜进击，终于全歼敌军，灭亡了一度桀骜不驯的有扈氏，取得了甘之战的彻底胜利。

夏启能够在甘之战中获胜，在于他所代表的是新兴阶级势力的根本利益，他的所作所为，是和社会发展的主导方向相一致的。在于他善于开展战前动员，申明军纪军法，调动参战将士的战斗积极性。在于他正确部署兵力，实施高明的车兵作战战术指挥，尽敌为上，一战而胜。至于有扈氏惨遭败亡，也不是偶然的。其主要原因，乃是它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从事的战争性质上的保守落后。另外，其在作战指导方面也显然是消极被动的，既没有进行必要的战前动员，又